

〔意〕L·伯戴克 著
周秋有 译

十八世纪 前期的中 原和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CHINA AND THE
TIBET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意〕L·伯戴克 著

周秋有 译

十八世纪前中期
的中原和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赠平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By the Luciano Petech, Leiden 1950.

本书根据刊于《通报》单刊本1972年第一集的修订本译出。

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

〔意〕伯戴克 著

周秋有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1987年8月西藏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书号：ISBN7—223—00022—8/K·7

定价：1.80 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是西方近年出版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一部重要专著，此书作为《通报》单刊本 Monographies de T'oung Pao于1950年在莱登Leiden出版。全书共有十六章，并有附录、年表、书目及索引。1972年此书修订再版(见《通报》单刊本，1972年，第一集)，修订版改动较大的是第三、四章及年表。译者是根据这次修订本译出全书的。

作者伯戴克Luciano Petech，意大利人，他是著名的藏学学者杜齐G·Tucci教授的学生。伯戴克专门研究西藏、尼泊尔及拉达克地区的历史和民族关系，成绩很大。他有关西藏的重要著作除本书外，主要还有《拉达克历史研究》、《1728年到1959年西藏的贵族与政府》、《旅居西藏、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1681年至1683年西藏、拉达克及莫卧尔战争》及《十八世纪西藏历史注释》，等等。作者在本书里经常引用后三个著作。

《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一书，材料丰富，内容充实。伯戴克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广泛地使用了以下三类史料：

一、一直没有被利用或很少被利用的藏文著作，如《七世达赖喇嘛传》、《班禅二世传》、《班禅三世传》、《颇罗鼐传》、《达隆首领史》、《青海史》、《甘丹寺法台传》、《普布觉寺的阿旺强巴活佛生平》及《导盲》(即西藏地方官方印谱)等。

二、汉文第一手史料，主要有《大清历朝实录》、《卫藏通志》、《皇朝藩部要略》、《西藏志》、《钦定西域同文志》及《圣武记》等。

三、旅居西藏及尼泊尔传教士的文献及许多当代中外文名

著，如《旅居西藏、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朝皇帝的关系》、《现代中国史断片：西藏征服记》、《十七、十八世纪的中亚细亚》、《清代文书行移制度》、《厄鲁特王噶尔丹的蒙古文片断》、《清代中国名人传》、《蒙古佛教史》、《藏语中的借词》、《卡尔梅克史评注》、《西藏画卷》等五十多部(篇)(详见本书第一章及附于本书后的书目)。

在本书里作者介绍他这本书主要根据藏汉文史料而写；1705年至1732年以藏文史料为主；1732年至1751年汉文较为丰富，利用的多，对一些重要的史料和著作，作者都有简明的评论，指出它们的优缺点，有的甚至说明来源，并附有原文书名。在本书后面还附有征引的书目。因此本书叙述的事件较翔实可靠，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西藏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和重要的线索。

本书大致可分为五部分。

一、介绍本书的资料来源（第一章）。

二、叙述蒙古和硕特部在西藏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错的斗争及其在清朝中央支持下掌权的过程。五世达赖喇嘛利用固始汗援助，掌握了西藏的政教权力，但他在晚年时把政权交给第巴桑结嘉错。第巴桑结嘉错在五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匿丧不报，独专藏政，与固始汗之孙拉藏汗发生了冲突。康熙皇帝严厉斥责了第巴桑结嘉错。1705年拉藏汗执杀第巴，清朝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在这一部分里作者还用了很大的篇幅详述拉藏汗擅立假达赖及其与西藏宗教界及青海王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第二章）。

三、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反对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的斗争。1716年冬策旺阿喇布坦进兵西藏，杀拉藏汗，洗劫拉萨，准噶尔军事占领下的西藏一片混乱。在颇罗鼐和康济鼐的领导下，西藏人民积极反抗准噶尔的统治。随后清朝调发大军平乱，恢复西藏的安

定，并派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驻在西藏（第三章至第五章）。

四、清朝中央通过驻藏大臣和驻军在西藏行使主权；达赖喇嘛和摄政王及郡王在中央的支持保护下，通过噶厦政府在西藏地方进行行政管理。这时期西藏地方执政贵族间的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件主要的事件：噶伦阿尔布巴为首的一小撮贵族谋杀了掌握实权的康济鼐，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兵平定叛乱；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杀害其兄，窃取大权，后被驻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诛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手下罗卜藏札什杀害傅清、拉布敦二位驻藏大臣及清朝平定拉萨的暴乱。作者也用了很多的笔墨叙述西藏地方与准噶尔部及不丹、尼泊尔、拉达克之间的关系（第六章至第十五章）。

五、对清朝中央在西藏的施政及汉藏文化交流的总结（第十六章）。

伯戴克对十八世纪前期这半个世纪在西藏所发生重大政治事件认为：“它决定了西藏地方后来将近两个世纪，当时造成的政治状况一直延续到1912年”，这说明了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对于西藏地方的发展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的。作者之所以要研究西藏的这段历史，正是因为它如此重要的缘故。在本书中，伯戴克对于这段时期发生的大事件，叙述详尽，剖析全面，观点明确，重点突出；对于这段时期的重要人物也都评论稳妥，分析认真，科判公允，注重背景。他能够在征引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尊重历史事实，提出新的看法，则是他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和重要学术价值，因而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但应当指出，伯戴克在本书中有些提法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的影响，例如把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仅仅看作是一种“监护”作用或所谓的“宗主权”，把西藏当作一个政治实体，接受着“中

国的征服”或“占领”，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但从整部书来看，比较客观，实事求是，许多看法是正确的。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忠于原文，力求通晓易懂，逐句译出，以供研究参考。对于书中出现的地名、人名、书名、官名和其他专有名词的译法，主要参考了《清史稿》、《大清历朝实录》、丁实存《驻藏大臣考》、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本所民族历史研究室编写的《藏族简史》（稿）、《准噶尔史略》（稿）及《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稿）等，采用了历史及习惯用法，也采用了现在通行的称法，并附上原文。另外，李坚尚同志在1978年译过伯戴克这本书的三至五章，译者也采用了其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和书名的译法，特此说明。

本书洋洋二十余万言，除英文外，还涉及古梵文和法、德、意等外文以及藏、蒙、满文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内容上又涉及清朝历史、蒙古史、西藏史和准噶尔史等，语言多变，历史复杂，情况特别，难度较大。为此曾经常常请教吴泽霖先生、柳陞祺先生和常凤玄同志，他们给予热情的指导，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这本书能够翻译出来是和他们的大力帮助分不开的。书中的法、德、意等外文的书名、人名及地名，主要请教罗致平先生、邓锐龄同志及赵锦元同志。在此谨向上述诸位老先生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人对于西藏历史了解不深，研究很浅，对语言文字，除英、藏文略知一二外，其它文种水平有限，译文一定有不少错误，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周秋有

一九八一年七月

再 版 前 言

《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一书似乎还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经二十一年的间隔，本书的部分内容很有必要予以修改，纠正一些错误，并需跟上近年来研究的进展，对整个历史进行改写。我对《通报》的总编及出版者使我这本老书得到彻底的修改和校正并献给学者界，不胜感激之至。

我注意到并考虑了近二十年来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此外还利用了我在1950年未能获得的藏文文献。本书改动最大的是第二章、第四章及世系表。

有几个错误得到纠正，例如把意大利传教士称为的摄政王“墀任布切”“Chiesré Rimboce”一语和甘丹墀任布切K‘ri Rin-po-c‘e of dGa’ldan 同等起来，这是错误的。很明显，“墀任布切”是“杰赛任布切”rGyal-sras Rin-po-c‘e 转写来的（见153页）。

在藏文的拼音方面也做了一些更改，在正文里用“‘”代替“a”（但所附的两张地图上的名字不改动，以免重画）。札什喇嘛Tashi-Lama 的称号基本上不正确，现已过时不用，故删去班禅一词前的札什喇嘛之称。

略语表

一、期刊

HJAS即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IHQ即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印度历史季刊》

J·AS即Journal Asiatique

《亚洲学报》

JASB即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孟加拉亚洲学会报》

JRAS即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PASB即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孟加拉亚洲学会纪录》

TP即T'oung Pac

《通报》

二、藏文书

A₂PC即Autobiography of the Secoud Pan-c'en

《班禅二世传》

A₃PC即Autobiography of the Third Pan-c'en

《班禅三世传》

Dad pa'i'dab brgya,即Life of Nag-dban-byams-pa

《太白德结》(阿旺强巴传)

K.Ann即Annals of Kokonor

《青海史》

L₇DL即Life of the Seventh Dalai-Lama

《七世达赖喇嘛传》

MBTJ即Mi dban rtogs brjod(Life of P'o-lha-nas)

《颇罗鼐传》

S₇ag-lun即Histtory of the chiefs of s₇ag-lun

《达隆首领史》

(详见绪言及史料)

三、意大利传教士文件

MITN即L.Petech,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e

nel Nepal(7 vols) Rome 1952—1956

伯戴克的《旅居西藏、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七卷)罗马1952至1956年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再版前言.....	(7)
略语表.....	(8)
第一章 资料来源.....	(1)
第二章 西藏最后一个和硕特统治者拉藏汗 (1705~1717)	(11)
第三章 一七一七年的准噶尔入侵.....	(42)
第四章 准噶尔人的占领和西藏人的起义.....	(68)
第五章 中国对西藏的征服.....	(87)
第六章 康熙末年中国的保护国.....	(97)
第七章 西藏与雍正皇帝的新政策.....	(117)
第八章 康济鼐被谋杀及颇罗鼐的备战.....	(141)
第九章 一七二七年至一七二八年的内战.....	(152)
第十章 审判诸大臣及颇罗鼐掌权.....	(173)
第十一章 达赖喇嘛流亡期间颇罗鼐的统治 (1729~1735)	(191)
第十二章 行政官和藏王颇罗鼐 (1735~1747)	(213)
第十三章 西藏最后一个“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 (1747~1750)	(239)
第十四章 “国王”的终结与达赖喇嘛 世俗政权的兴起.....	(260)

第十五章 在中央保护的前半个世纪的	
西藏行政管理.....	(281)
第十六章 结论.....	(306)
附录：汉文文件.....	(310)
十八世纪前期（1705~1751）大事系年.....	(320)
书 目.....	(328)
索引（略）	

第一章 资料来源

1705年至1751年决定西藏后来将近两个世纪，当时造成的政治状况一直延续到1912年。欧美学者对这些年代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已有适当的评价，我们至少有这时期的三个好材料：

一、《通报》第十一期（1910）1至104页上柔克义写的《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朝皇帝的关系》。此文主要根据魏源1842年出版的《圣武记》及《东华录》的最后一部分，即1884年王先谦刊行的那部分。

二、《通报》第十二期（1911）197至235页及375至424页上韩尼希所著《现代中国史断片：西藏征服记》。从《准噶尔方略》满文本翻译的有关1718年至1720年西藏战役的三十七份官方文件译文。

三、古朗在《里昂大学年刊》新编复制本第二十六期（1912年）上发表的《十七、十八世纪的中亚细亚》。本文取材于王先谦的《东华录》（注一）。

但上述资料显然只根据当时找到的（P.2译者注，译文所据伯氏原著的页码）汉文史料以及旅居西藏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教士德斯得利及喀普清）提供的部分材料。这时期的藏文文献和清朝的《实录》一直没有被利用（注二），学者利用清朝的《实录》也只是1937年的事。本书根据藏汉文史料所写，1705年至1732年以藏文史料为主。1732年至1751年汉文文件比较丰富，更为有用。

有关这时期的藏文著作主要有四部。一、《七世达赖喇嘛传》(1708—1757)(注三)。作者是著名的蒙文丹珠尔经的编辑章嘉呼图克图Changchia Qutuqtu(藏文为lCan-skyā Rol-pa'i-rdo-rje)(注四)。1758年他在拉萨开始写这本书并于1759年完成。《七世达赖喇嘛传》按年代编写，有时还提供了事件的月日。这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这段时期在位的达赖喇嘛正式的传记，当然是最重要的资料。但西方学者对诸如此类著作大为失望。它们和宗教及其仪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时忽略了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把兴趣放在罗列一大堆拜见达赖喇嘛的蒙、藏、汉王公的名字及其准确年代。但文体优美，轻快流畅，是一部优秀的藏文散文诗。

第二部藏文著作是《班禅二世传》(1663—1737)(注五)。该书(P.3)突然中断，没有末页的题署，最后记事的日期为—732年5月1日；显然作者没有写完这本书。该书精心地采用西藏文学中最准确的编年学，按年代编排，几乎每个事件都提供了年月。当然，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它和《七世达赖喇嘛传》有同样的缺陷。虽然它的句法简单，文体朴素，但语言独特，词语罕见，结构异常。第三世班禅编写了《班禅二世传续》，一直叙述到1737年的事件(注六)。

第三部藏文书是《班禅三世传》(1738—1780)(注七)。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与上述一书雷同的基础上，它们有同样的优缺点；但语言更加简单，是一般的标准藏语。该书写到1776年底。

第四部藏文书是《颇罗鼐传》，这是最重要的一部书(注八)。它是西藏统治者颇罗鼐索朗多卜杰bsod-nams-stobs-rgyas of P'ō-lha(意大利传教士称他为“王”)从1728年至1747年卒前的传记(注九)。该书的作者是多喀瓦策凌旺札尔Ts'e-rin dban-rgyal of mDo-mk'ar，他原先是西藏大臣会议(译

者按，即噶厦）的财政官员；1828年他被委任为颇罗鼐第一个大臣会议的成员，也是1751年设立的大臣会议的四位噶伦之一，他死于1763年（注十）。他于（P.4）十月一日即公历1733年11月7日在江喀孜（江孜）*rGyal-mk'ar-tse* (*Gyan-tse*) 完成这部著作。策凌旺札尔写于该书主人翁在世时，他身居高职，便于了解其目击事件的内情。因此他的著作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作者是颇罗鼐热烈的辩护人，因此该书难免有过于偏爱颇罗鼐的不足之处。另一个缺陷是年代含糊不清，难得提供事件发生日期。可庆幸的是能从其它史料来成全它。该书前面一百页左右文体绮丽冗长，有时非常难懂，偶尔应用印度的*alamkara*的句法（注十一），时或自由地插入长短不齐的诗句。随着故事的发展，文体逐渐浅显易懂，有时全是口语；在叙述到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作者却情不自禁地抒发感情，一时轻快坦然。

我们还使用小部头的著作补充上述四部著作。

《达隆首领史》（注十二）是一部有很大价值的地方的编年史，非常有趣地间接说明西藏历史；该书由敦本多喀瓦·久美才旺班觉*rtsis dpon mDo-mk'ar-ba' Gyur-med-ts'e-dban-dpa-'byor*下令于1827年至1829年编的。第三十六章即最后一章（387叶至442叶）里有《颇罗鼐传》的作者策凌旺札尔的传记，这对我们来说特别有兴趣。

《青海史》这书名取得不太合适（注十三），这是松巴堪布·益喜班觉*Sum-pa mk'an-po Ye-ses-dpal-'byor*于1786年写的。它的实际内容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西藏史和青海的蒙古首领的一些情况以及这两个地方的地理概况。

有个次要的资料来源是《甘丹寺法台传》或《甘丹寺主传》*K'ri Rin-po-c'e'or abbots of dGa'.Idan monastery* (P.5)。这些法台的地位及影响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法台

都不是转世的，而是根据他们的学识造诣来选定，在位期为三年。该集录(注十四)包括从第四十七任法台(在位期为1699至1700年)至第七十一任法台(在位期为1828至1829年)各任法台的生平。1810年和1831年许多作者编了这些法台的单人传记。

少量资料来源于班禅三世所著《普布觉寺的阿旺强巴活佛生平》P‘ur-bu-lcog Nag-dban-byams-pa(1682—1762)(注十五)以及隆多喇嘛阿旺洛桑Klonr-dol bla-ma Nag-dban-blo-bzan的两个编年小册(注十六)，他们大约写于1790年，因为书中记载的最后一个年代是1787年。

最后谈谈一本小册子《导盲》Lon-ba’i-dmigs-bu(注十七)。这是一种官僚印鉴，专门描述达赖喇嘛和摄政王的印章。印鉴按年代顺序编排，年代底下有时没有内容，只起着标题的作用。作者不详。这显然是本世纪初某年开始写的，尽管接近现代，还是能提供别处所没有的资料。

汉文史料主要是《实录》丛书(大清历朝实录)(注十八)。这些(P.6)无价的清代文件正式编辑的集录是清朝最重要的、最有权威的史料。它代替了《实录》的摘录《东华录》(注十九)。略为精读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圣训》，就可知其中所有的文件实际上都包括在《实录》里。因此本书不引用《东华录》和《圣训》。

在二级史料中以《卫藏通志》最为突出。其不知名的作者大约写于十八世纪末，但直到1896年才刊行(注二十)。它是十八世纪后期有关西藏情况的真实资料的来源。在第十三卷(纪略)里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情况。但把重点放在晚近的事件上，尤其是1791至1792年的廓尔喀战争。

与上一史料同等重要的是《皇朝藩部要略》，该书由祁韵士Ch‘i Yun-shih(1751—1815)所编，其子祁澐藻Ch‘i Ch‘un-t-sao于1845年首次刊行。它提供了别处所找不到的西藏贵族家系。

就十八世纪初期的西藏来说，《藩部要略》几乎是清史馆的赵尔巽 Chao Erh-hsun 于 1914 年至 1927 年主编的五百三十六卷《清史稿》唯一的资料来源（注二十一）。原来打算把《清史稿》编成第二十五史，并按照正史体裁来编辑。因此，就所述时期来看，有关西藏的专论（《藩部》八卷，全书的五百二十五卷）离开《藩部要略》是没有单独使用价值的。

《西藏志》是由参加 1720 年中国远征拉萨的焦应旗 Chiao Yin-ch'i 在 1737 年后写的（注二十二），该书给更大的著作增添了一些有趣的细节。

《欽定西域同文志》是几种文字的合璧辞书，大约编于 1771 年（注二十三），主要是一些有关家系的材料。

《圣武记》也用一些。我们还使用了韩尼希翻译的《准噶尔方略》以及 1891 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柔克义翻译的《卫藏图识》。

另外一套资料是意大利传教士留下来的文件，耶稣会教士德斯得利 1716 年至 1721 年在拉萨写了非常重要的记事，再加上 1707 年至 1711 年，1716 年至 1733 年以及 1741 年至 1745 年旅居拉萨的喀普清教士的记录。现在上述材料已经有了完整的评论性的版本（注二十四）。德斯得利的记事也有了（不太全的）英译文（注二十五）。

关于年代的用法结语。汉藏日期里，日子用阿拉伯数字或干支，月份采用罗马数字。诸如 17 / 1X（九月十七日）或 kuei-mao / 1V（四月癸卯）。欧洲日期写全，例如 November 13th（11 月 13 日）。我们发现藏族日期有时用“霍尔” Hor 历（即维吾尔历）月份，实际上是汉历月份，因此我们把它看成汉历月份，没有注明“霍尔”的地方，可能要相差几天，甚至一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确定的日期可用，就用大约的汉历日期，前面标上“C”的符号。